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26 期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来源集刊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巫永平 / 主编

本期焦点:

定性研究: 从实证到解析

朱天飏

直觉与顿悟: 知识生产的隐性过程

熊易寒

统计学与人文研究的哲学思辨

——从批判性视角看人文研究中的“不确定性”

邓 柯

所有制属性和大型企业效率: 双扭曲视角下中央企业的实证研究

胡鞍钢 马英钧

城市更新视角下中西方城市贫困社区治理路径演变及改造模式研究

孟延春 谷 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7年第3期 总第26期

巫永平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管理评论. 2017 年. 第 3 期: 总第 26 期 / 巫永平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1 - 2123 - 1

I. ①公… II. ①巫… III. ①公共管理 - 文集 IV.
①D035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430 号

公共管理评论 2017 年第 3 期 总第 26 期

主 编 / 巫永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岳梦夏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123 - 1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委员会

主 编：巫永平

副主编：彭宗超

英文编辑：Nancy Hearst

学术委员会主席：薛 澜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俊汉 台湾大学

陈振明 厦门大学

楚树龙 清华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邓特抗 香港大学

丁宁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胡鞍钢 清华大学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

景 军 清华大学

李 强 清华大学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卢 锋 北京大学

路 风 北京大学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王乐夫 中山大学

吴德荣 莱顿大学

王 名 清华大学

王浦劬 北京大学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王有强 清华大学

魏尚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萧全政 台湾大学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

杨大利 芝加哥大学

杨燕绥 清华大学

姚 洋 北京大学

于 安 清华大学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

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

周志忍 北京大学

左学金 上海社会科学院

J. P. Borns 香港大学

A. T. Saich 哈佛大学

编辑助理：张秀吉 凌 争

编辑部地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邮编：100084

电话：010-62782120

传真：010-62782120

E-mail: review@mail.tsinghua.edu.cn

目 录

研究方法

编者按	/ 3
定性研究：从实证到解析	朱天飏 / 5
直觉与顿悟：知识生产的隐性过程	熊易寒 / 15
统计学与人文研究的哲学思辨 ——从批判性视角看人文研究中的“不确定性”	邓 柯 / 24

论 文

所有制属性和大型企业效率：双扭曲视角下中央企业的实证研究	胡鞍钢 马英钧 / 39
城市更新视角下中西方城市贫困社区治理路径演变及改造模式研究	孟延春 谷 浩 / 53
基于 S-CAD 方法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政策评估：以义乌为例	王志锋 徐晓明 谢天成 黄志基 / 66
腐败与政治信任 ——基于中国省级政府的多层次分析	吴进进 刘炯言 / 92

书 评

组织的制度化如何影响组织对危机事件的意义建构 ——评《应对危机的不确定性》	魏玖长 / 111
--	-----------

探索危机管理之道

——兼评吕孝礼助理教授新著《管理危机不确定性》 张海波 / 118

官僚制的经济学分析

——读米塞斯《官僚体制》 赵琦 / 127

公共事物治理：中国国情下的制度与科层结构

——评《中国水权评价》 何理 / 137

基于西方“均势”逻辑的旧式全球治理观

——评基辛格《世界秩序》 蒋先欢 / 149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

Editorial Note : Multipl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Dialogue and Blending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 3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Empirical to Analytical Traditions	Tianbiao Zhu / 5
Intuition and Inspiration: The Tacit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Yihan Xiong / 15
A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Statistics and Humanistic Studies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Uncertainties in Humanistic Research	Ke Deng / 24

Articles

Ownership and the Efficiency of Big Busines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ual Distortions in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Angang Hu and Yingjun Ma / 39
A Review of the Evolving Modes of Governance in Poor Communiti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Urb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newal	Yanchun Meng and Hao Gu / 53
A Case Study of Yiwu City Based on the S-CAD Evaluation Method	Zhifeng Wang, Xiaoming Xu, Tiancheng Xie and Zhiji Huang / 66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Trust: Based 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hina'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Jinjin Wu and Jiongyan Liu / 92

Book Review

How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Affects Crisis Incidents —Comment on “A Response to the Uncertainty of Crises”	Jiuchang Wei / 111
---	--------------------

An Exploration of Crisis Management

—Also Comments on the New Book *Managing Uncertainty during Crises* by Assistant

Professor Lv Xiaoli Haibo Zhang / 11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Bureaucracy

—Reading Ludwig von Mises's *Bureaucracy* Qi Zhao / 127

Governance of the Commons: Institutional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unde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 Comment on *Assessing Water Rights in China* Li He / 137

An Old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Western "Balance of Power" Logic

—A Critical Comment on Henry Kissinger's *World Order*

..... Xianhuan Jiang / 149



研究方法

编者按：多重传承与创新：质性研究方法的对话与交融

自社会科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恢复以来，关于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优劣之争日趋激烈，歧见渐深。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既不充分，也不平衡。为了丰富这一讨论，《公共管理评论》自本期起将连续三期为读者呈现一组讨论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方法的笔谈。这组笔谈源于2017年6月18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的“走向社会科学方法的自由王国：重读‘KKV’学术讨论会”中的部分参会者，体现了他们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最新思考。我们今后将持续刊登这方面的文章。

我们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重新反思以推断（inference）为目的的质性研究方法逻辑。这一逻辑将随机抽样、随机化干预、变量控制、力图获取更多的观察值等作为追求实现描述性或因果推断的根本路径。而将这一方法逻辑全面推广于质性研究的努力，集中体现在由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和Sidney Verba（简称KKV）所著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理》（*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中。此书自出版后，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提出的多项研究方法原则，如避免依据因变量的变化选择案例、研究者需要尽量多地增加观察值等，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方法准则。

学术研究的动力在于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看到自身视角的局限，进而发现理解世界新的可能。笔谈的作者们揭示出：KKV的逻辑只是众多方法论逻辑传承中的一种。研究者的方法素养并非只是体现于掌握了多少研究技术，更为根本的是，他们需要跳出某一种逻辑的窠臼，理解不同方法论逻辑的本质特点，看到它们各自在解释世界上的优势和劣势。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在洞悉不同技术背后的方法论逻辑的基础上，扬长避短，自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由方法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正如著名政治学者萨托利（Satori）所说：“没有任何研究方法论（methodology）不是具有自我逻辑与自我反思的。我们需要严格地区分‘方法论’与‘研究技术’的差别，而且后者绝不能代替前者。一个学者，就算可以成为出色的研究者和数据的操控者，也依然可能是没有自觉意识的。”

笔谈的作者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于对具体方法和研究著作的分析，提出

了不同于“KKV”路径的多重方法论传承。这些传承包括：将因果解释理解为发现“充分性”或“必要性”条件的比较研究；以主观、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来勾勒微观因果机制的研究；以探索概念世界的多元建构过程为目标的解析性研究等。笔谈的作者甚至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计的差异，来说明“KKV”路径的局限。通过对经典和最新学术成果的分析，作者们展现了这些方法论逻辑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落实于实际研究中。笔谈体现了当今学界对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的新动向。

无论是何种方法论传承，其所关心的问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现象，以及如何将这样的解释提升为理论知识。不同的传承基于各自的逻辑，对这一根本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答。比如，他们对什么是“因果”、什么是“解释”、什么是“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基于这样的定义，他们推演出一整套方法论逻辑，自洽性地说明为什么传承足以实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并产生理论知识。由于方法论逻辑的根本差异，我们发现，被某一种传承视为“真理”的认识，在另外的传承中则被视为“谬误”。而在某种传承看来无法解决的“黑洞”，恰恰是另一种传承的“亮点”。比如，根据因变量变化选取案例在以推断为目标的方法传承中被力图避免的做法，却在其他传承中得到了充分承认。

我们力图勾勒出质性研究中不同传承的范畴与差异，我们的目的并非在于站在某种传承的立场上批评其他传承。我们相信，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人类探索世界的一种路径。只有当我们可以拥有更加宽广的方法论视野时，我们才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认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正如笔谈的作者们注意到的，如果研究者聚焦于对“人”的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互动关系的探讨，那么他们将会把田野工作视为研究的根本，他们会在田野工作中努力地去体会被研究对象的自我世界，将其作为“人”的意义体现出来，而不只是处理为可以被测量的变量。这种“顿悟”与“想象力”将使研究者在解释世界和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获得无尽的灵感。

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着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刻变化。新的时代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进入中国治理丰富实践的田野，以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理论的双重学养为拉动，创造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可以被融于人类共同知识体系的理论语言。新的时代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丰富的治理实践就是无尽的研究资料宝库，而方法论的逻辑指导下的方法操作，正是打开这一宝库大门的钥匙。当研究者可以打开更多扇大门，他们会惊讶地发现比变量和数字更加丰富的世界。他们将不再只是坐在电脑前的“键盘侠”，而是植根于田野世界的观察者和沉浸于理论世界的分析者。最终，他们将为人类不同政治文明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解答。

巫永平 罗伟楠

定性研究：从实证到解析*

朱天飏**

【摘要】本文通过讨论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尤尔查科的《苏联的最后一代》以及和文凯的《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三部专著来展示定性研究从实证到解析的多样化发展。比较这三部在社会科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专著可以看出，其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倾向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根据上述比较分析，本文在最后提出以下命题以供争鸣，即定性研究的长处在于细节描述、概念辨析和具体因果机制的发掘，因此更适合非实证性研究。当然，实证性研究和非实证性研究对我们思考人类的社会行为都有重大意义和贡献。

【关键词】定性研究；话语；因果机制

— 如果将社会科学理解为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方法问题则在于如何解释或阐释这类人类行为。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对于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形成于1850~1945年，而且在20世纪，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的核心（普适性研究）学科。^①随着科学逐渐在新兴的社会科学里占据主要地位，用科学方法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

* 本项研究受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资助。本项研究源于2017年6月18日清华大学罗伟楠老师组织的方法论讨论会，他进而将讨论会的部分发言组织成稿。本文用案例示范的后两本专著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组织的第一期（2016年5月13日）和第三期（2016年10月22日）比较政治学读书会中作过专门讨论，笔者受益匪浅，这里一并鸣谢！当然文责自负。

** 朱天飏，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1.

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或做出结论。”^① 华勒斯坦等也将科学定义成“对超越时空并保持正确的普适性自然法则的追求”。^② 虽然科学的思考在社会科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华勒斯坦等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忽视社会科学的其他基础。他们认为，19 世纪开始形成的社会科学其实深受之前的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影响。一个是追寻自然规律的科学或自然科学传统，另一个是关注感性、直觉和诠释的人文传统。特别是有很多学者“对获得科学规律或构想假说不感兴趣，并坚持认为，每个具体‘事件’都必须在其对应的具体历史里进行分析。”^③

一些学者从诠释的角度指出，解释（explain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是不同的。^④ 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是直接观察和解释。这对于自然界也许比较适用。但是，当科学被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争论就会变大。因为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里，被观察到的同样的行为可能包含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也就是说，具体事件应该放在与其相关的具体历史中理解。因此才有学者认为，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对前者可以解释，而对后者关键在于理解。当然，社会世界是不是与物质世界本质一样属于主观判断。一样的判断使科学“跨界”进入社会世界，通过实证性研究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不一样的判断使人文传统得以坚持，并可通过解析性研究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

从实证性研究到解析性研究，对规律的寻求越来越少，对意义的探索越来越多。学者对社会世界的主观认识使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上述两点之上或两点之间的某个位置。从定性研究的特点看，即通过案例分析、历史比较、过程追踪、田野调查等方法 and 手段对社会现象进行细节性的描述和研究，从而展示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实证性研究，也可以是解析性研究。^⑤ 下面通过三本社会科学著作的讨论来展示定性研究在不同研究传统下的应用，以期说明定性研究的多样化发展。

一 科学倾向的定性研究

关于如何将定性研究科学化的讨论非常之多，在美国这个社会科学的“大本

① Charles Darwin, "Autobiography," 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Vol. 1, edited by Charles Darwin and Francis Dar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7.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5.

④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1991.

⑤ 稍详细的讨论请见朱天飏《〈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与定性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营”尤为如此。很多定性研究的学者急于证明这种研究类型也是科学的,^①也有已经占据科学一方的定量研究学者与定性研究学者一起论证此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在方法论领域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一书的作者们。^②他们指出:“……定量和定性两种传统的不同只是风格上的,而且这种不同在方法论上和实质上都不重要。……定量和定性研究都可以是系统的和科学的。”^③这些学者从统计学的基本逻辑出发,对定性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指导,其中的关键部分就是尽量根据自变量^④选择案例,而不是因变量。根据定量分析的逻辑,选择案例时还要尽量覆盖自变量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下面用《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⑤作为案例对定性研究的科学化加以说明。

哈佛大学学者斯考切波(Skopc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已为人所知很久。这一著作1979年出版以来获得了两项学术奖,并已翻译成意、法、西、葡、中、韩、希、土等语言并广泛流传,它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书籍之一。^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探讨社会革命的成因,后半部分展示革命的结果。对此书的方法论讨论一般都集中于前半部分,本文也是如此。斯考切波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试图建立一个对于爆发社会革命的系统性解释。当然,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系统性解释,比如解释范围基本限定在身处地缘政治激烈竞争和市场经济逐渐形成时代的官僚制农业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相对富裕,在政治上颇具野心。作者选取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核心案例,并提出,行政—军事崩溃与农民暴动共同引发社会革命。

其基本逻辑是,处于地缘政治竞争漩涡而且政治上又颇具野心的国家经常会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应付与其他国家的军事竞争,国家组织不得不尝试从主导阶级汲取更多财政收入,而这必然带来双方的矛盾。如果矛盾加剧,就可能导致国家上层的行政崩溃。法国和中国在革命之前的情况都是如此,俄国则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军事崩溃而引发了国家行政功能的紊乱。另外,这些大型官僚制农业国也正好处于一个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时代。当然,这种转型也与在军事

① 最近的一次重要尝试当属: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5。

④ 在定性研究中有称“变量”为“变项”的,似乎更加准确,但这里仍按一般习惯称“变量”。

⑤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⑥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 Jeff Goodin, “How to Become a Dominant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 The Case of Theda Skocpo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6 (3), pp. 293-295。

竞争压力下国家日益增强的财政汲取需要有关。转型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加剧了传统农业中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剧烈的农业商品化过程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最终走上暴动的道路。

从科学的方法论直观斯考切波的主要案例选择是不无问题的。显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案例不是按照覆盖自变量变化的基本要求做的。因为它们都是爆发社会革命的案例，甚至连因变量的变化（即有社会革命和无社会革命）都没有覆盖。科学选择案例要求覆盖自变量所有变化以达到展示单一变量具有影响力之目的，比如以下四个典型案例的选择：

案例 A：有上层崩溃 + 有农民暴动 = 有社会革命

案例 B：无上层崩溃 + 有农民暴动 = 无社会革命

案例 C：有上层崩溃 + 无农民暴动 = 无社会革命

案例 D：无上层崩溃 + 无农民暴动 = 无社会革命

比较案例 A 和 B，二者都有农民暴动。在此种情况下可观察上层崩溃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案例 A 既有上层崩溃又有社会革命，案例 B 既无上层崩溃又无社会革命。可见，在控制农民暴动这个变量后，案例 A 和 B 可以用于展示上层崩溃对社会革命是有影响的，即在都有农民暴动的情况下，有上层崩溃就会有社会革命，无上层崩溃就没有社会革命。依此类推，比较案例 A 和 C，可以得出：在都有上层崩溃的情况下，有农民暴动就会有社会革命，无农民暴动就没有社会革命。最后，比较案例 A 和 D 可以得出：上层崩溃和农民暴动是同时起作用的。

上述案例选择的方式体现了按自变量（的变化）选择案例的重要性。因为因变量的变化是有限的（在这本书里只有两个），而只要自变量多于一个，因变量的变化就难以覆盖自变量的变化了。但是，如果作者真的这么选择，她的研究效果恐怕就会大打折扣。作者是被社会革命所吸引，以研究社会革命为目标。但上述科学的案例选择要求只选一个有社会革命的案例，却要选择三个没有爆发社会革命的案例，这似乎并不符合作者的研究初衷。从两全的角度讲，作者以爆发社会革命的事件为主要案例，以无社会革命的案例作为辅助案例，这似乎更合适一些。

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斯考切波的确也是这么做的。除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外，她还穿插了一些小的比较案例，包括日本明治维新（1868～1873 年）、普鲁士改革运动（1807～1814 年）、英国议会革命（1640～1660 年）、德国革命（1848～1850 年）以及俄国农民运动（1905～1907 年）等。这些都是上层崩溃和农民暴动两者缺一的案例，而且都没有爆发社会革命。前四个案例都缺少农民暴动，而最后一个案例则缺少上层崩溃。案例 D 类型的事件（即无上层崩溃、无农民暴动以及无社会革命）没有出现在这个研究中。当然，用案例分析来论证“什么都没有”似乎既无必要又很难实施。

总的来看，《国家与社会革命》所讨论的案例基本覆盖了自变量的变化。虽然

案例大小不一，重复性也比较高，但仍可作为一个科学倾向的定性研究案例。如果我们将下面的两个例子与之对比，这点就尤为明显了。

二 解析倾向的定性研究

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对社会现象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寻找现象间的系统性因果关系。比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开篇就将社会革命定义为“社会中国家和阶级结构基本的、快速的转化，伴随着自下而上以阶级为基础的暴动，并部分通过其实现上述转化。”^①斯考切波以此定义将社会革命区别于反叛和政治革命等政治社会现象。且不说定义好了的社会革命能否被“测量准”，这个定义的基础离不开权力、权利、国家、社会、阶级、利益、结构、关系等这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而这些基本概念恰恰是解析倾向的学者所要质疑和挑战的。

这些核心概念的基本问题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政府所在建筑、各种国家的标志、总统就职仪式等，但这与我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国家概念仍然相距甚远，更不用说像权力、关系等其他概念了。因此，无法直接观察到就会在定义上产生歧义，这不仅因为不同的人观察到的现象不一样，而且从自己的经验里补入的对国家的理解也不一样。更有甚者，有人会进一步怀疑这些概念是否客观存在，还是仅仅被建构出来的对社会行为的解读。这不是说对是否有真实的总统就职仪式或者对政府建筑里是否有行政人员工作产生怀疑，而是对政治家或官僚的行为的“国家”解读表示怀疑。社会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观察到的是暴力现象和政权更迭，但社会革命这个概念可能是被想象出来的，这个想象基于那些同样不能被观察到的上述基本概念。社会革命如此，用来解释社会革命的所谓上层崩溃和农民暴动恐怕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受解析传统影响的学者，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不该是证明系统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对社会现象的解读以及这些解读的由来。擅长发掘细节的定性研究在这里就有了用武之地。这里介绍的政治人类学专著《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②就展现了具有解析倾向的定性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学者尤尔查科（Yurchak）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代人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和他们所面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苏联的最后一代这里指的那些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出生、到80年代中期15至34岁的人群，他们在苏联解体前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①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

② 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